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新发展

张 艳

(宁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 政党外交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整整90年的光辉历程。从1949年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62年来,中国共产党成为战后世界现代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本文着重探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对外关系的新特点、新发展。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对外关系; 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2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2011)20-0043-03

一、我党对时代主题有了新的认识—— 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

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是党和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们党对时代的主题的认识和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此也对我党的对外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处于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与印度支那战争,1962年的对印边境自卫还击战,1969年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等,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一是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成燎原之势,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二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的对抗,“铁幕”笼罩,“冷战”尖锐。战争与革命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美国的原子弹威胁,对于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再次发表了一篇气贯长虹、洋洋洒洒的讲话。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

氢弹到处摔。”“不是我们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是摔原子弹、氢弹。”“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从朝鲜战争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侵略性、扩张性的忧虑明显地加大,他不遗余力地关心的,就是怎样挫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富有侵略性的干涉政策。这一时期,是他发表最激烈的言论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期。在国际关系上,是中国和美国最疏远的时期。

基于对那个时代主题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认识,上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国际统一战线,即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划分敌友的重要依据;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输出经典理论等手段来支援“世界革命”,维护世界和平,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上世纪50年代对苏联的“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等建立同志加兄弟的关系;60年代的抗美援朝统一战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和论战;70年代早期对苏的“一条线、一大片”,准备打仗、打大仗,“三个

[作者简介] 张艳(1976—),女,山东人,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理论教育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世界”划分的思想等，都是上述指导思想的反映。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适时的调整。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前后，正是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演变的关键时期。怎样分析、判断时代特征，对时代主题如何认识，对我党制定和实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和战略至关重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特点，许多原殖民地国家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美苏两强争霸世界的态势发生变化，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分化改组，多级化世界初露端倪。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明显增强。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敏锐和眼光，及时捕捉到了国际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即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据此对时代的主题作出了新判断。1980年初，邓小平指出：“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983年3月，邓小平又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以前总是担心打仗”，“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初，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经济或者说发展问题。”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对时代主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

二、党的对外工作重点有了新的转变

——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

随着我们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20世纪最后20年，我党对外工作的重点也逐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而转变。概括地讲，就是由“经济为对外工作服务”转变为“对外工作为经济服务”。

1980年初，邓小平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邓小平后来又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要紧紧抓住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不放，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这个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由“经济为对外工作服务”向“对外工作为经

济服务”的重大转变，是我们党经过长期的实践，通过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而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为了支持世界革命，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曾勒紧自己的裤腰带，向广大的亚、欧、非、拉美等110多个国家提供过大量的慷慨援助，绝大多数是无偿或无息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方面，党际关系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突出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一致性或相近性，并由此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亲疏。如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60年代、70年代与印度支那三国的关系，与朝鲜、古巴、蒙古等国的关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受党际关系制约和决定的。经济服从、服务于政治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新认识、新定义，适时调整了对外工作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的经济水平点相对较低，综合国力也不是很强，但我们的外援量却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很大调整，对外援助的方式、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那种片面单一的方式，而朝着互惠互利、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此前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误区和意识形态争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必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说话的分量越来越大。相反，我们的外援却逐年降了下来，但我党的对外交往不但没有停顿而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开创了党际关系的新局面。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结于我党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对党的对外关系策略的正确把握，对经济与外交两者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我们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思想，先集中力量把中国国内的事情办好，发展自己。

三、党的对外工作内容和机制有了新的拓展

——由局限于同各国共产党交往到同各国各类主流政党全方位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时，一直强调平等、自主，反对“老子党”“中心说”“一贯正确论”。认为各国政党对自己的国情最有发言权，应当尊重他们的主张和看法，不要对别国的政党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指导原则有别于我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为党际关系有别于国与国的关系。最早明确系统提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原

则的，是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所作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依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我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在当时还是限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这一特定的对象。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党对外交往范围、内容和形式的扩大，1992年、1997年和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政治报告中，都重申了我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四项原则，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江泽民将我党原来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四项原则延伸扩展为处理一切愿同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的原则，扩大了党际关系的对象和范围。

当代各国政党，无论执政、参政还是在野，都着眼于新的世纪，探索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世界范围政党之间的国际交往相当活跃，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望与我们这个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进行交流、沟通与合作，借鉴我党成功的“智慧”。这就带来了党的对外工作范围的大为拓宽，空前活跃。仅2000年，我党就接待了130多个各类外国政党代表团到访，同时，我党也派出了近90个不同级别的团组出访，以进一步深化党际交往，更好服务总体外交。

我党的历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出访时，都安排时间会见来访国家和我有政党关系的主要政党的领袖，就共同关心和感兴趣问题交换看法，加深了解。同时，还广泛接触来访国工商企业界知名人士，探讨扩大经贸和相互投资的途径，吸取一切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益的东西。如2000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贾庆林、李长春、吴官正、黄菊等出访时，既谈政治，也谈经济，与来访国探讨扩大经贸合作的可能性，促成了一些合作项目。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出访北欧时，还深入考察了有关国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和城市文明建设等情况。李铁映出访时，着力就来访国的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曾庆红出访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时，对

这四国的公务员制度、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人大、政府、政协中未担任领导职务的李长春、贺国强、周永康等领导同志，在出访时除会见来访国的政府高官外，另外还要会见该国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加强沟通。出访既谈经济，同时也注重加深政党间的党际关系。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打破坚冰，推动两岸关系在新的世纪进一步的缓和、两岸同胞的进一步往来，首先也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党际交往，平等谈判、友好协商来实现的。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冲破阻力，毅然决然访问大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开辟了国共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新局面。

2010年，中国共产党还创新了与外国政党的交流机制，内容和交往方式有新拓展，开创了党际交往的新局面。2010年3月31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12月2日至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又举行了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两次高层对话，双方围绕中美政党各自执政理念与实践、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中美政党交往走向机制化，丰富了双边对话的渠道。中国共产党还于2010年5月24至25日在北京举办了“中欧政党高层论坛”，论坛主题为“全球性挑战与中欧合作”。中国共产党和包括英国工党、法国人民民主联盟、欧洲自由党在内的50多个欧洲主要政党齐聚一堂，探讨治国理政经验，共商中欧关系大计。论坛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分别出席有关活动。来自欧洲地区性政党、欧洲议会党团和部分欧洲国家主要政党的50多位高层领导人和政要出席论坛。论坛取得了重要成果。

总之，党的对外关系是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外交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对外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把它看做是维护中国国家最高利益，发展与世界各国、各政党关系，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里，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具体交往中，都适应了新形势，开拓了新局面，创造了新辉煌，获得了新发展。